

码头、船只与侨批： 早期东南亚客家移民旅程的影像记忆

李小华 马静忆

【摘要】18至20世纪，客家移民在东南亚逐渐形成规模化社群，其迁徙历程不仅是一部生存奋斗史，也是一部文化适应与身份建构的历史。本文结合留存的旧照、图片和视频等影像资料，考察早期客家移民迁徙路上的艰辛历程与生存策略，认为客家移民通过内河码头和航船构建了跨海的交通网络，并借助侨批、水客和批信局等途径维系与原乡的社会和经济联结；同时，纪录片和口述史也揭示了移民在“契约华工”与“自由移民”双重路径下的真实经历，及其在异质环境中坚守文化内核、实现在地适应的能动性。文章从影像与文献互证的角度，还原了被主流殖民档案所遮蔽的移民声音，为理解东南亚客家社群的形塑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东南亚客家 移民旅程 影像文本 历史记忆

18至19世纪，伴随华南地区的人口压力与东南亚殖民经济的开发需求，客家族群开启了规模化的海外迁徙历程。这一过程不仅影响了东南亚的人口与社会结构，也催生了具有韧性、融合特征的客家移民文化。既有研究多从经济动因或制度史视角探讨华人移民，而对早期客家移民的物质遗存、影像文本与口述记忆的系统性整合仍显不足。本文以“码头、航船、家书、侨批”等影像载体为切入点，结合文献史料，试图重构客家移民的迁徙路径、生存策略与文化适应情形，并探讨其在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下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一、码头和船只旧照再现早期移民路径

在客家人海外迁徙的历史中，码头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功能和意义随时代流转而变迁。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为海外迁徙创造了条件；至明清，客家人的海外迁移在官方海禁与民间张力间曲折推进；鸦片战争后，随着汕头、厦门等港口被迫开埠，这一迁徙行为被纳入全球殖民资本主义

体系，进入了以“苦力贸易”为特征的大规模阶段。

自明清，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来，客家人向东南亚等地的规模化迁徙，其陆路旅程的终点和水路途径的起点，往往并非沿海口岸，而是内河码头。粤东、闽西、赣南地区的客家人，依托梅江、汀江等于三河坝汇成韩江、最终经汕头入海的地理水系，先汇聚于内河码头，再转往出海口岸。^[1]位于梅州州城、地处梅江上游的“水打伯公码头”便是这类内河码头的代表。^[2]“伯公”是客家人对土地神的特有尊称，该码头因古榕树下设有一处伯公神位而得名。这尊伯公没有宏伟庙宇，仅立于码头石阶之侧，常年经受江水涨落浸漫。即将远行的客家人与送别亲友常在此叩拜祈祷，既求旅途平安，也寄故土眷恋。独特的民间信仰与绵长的出洋历史，共同维系着此处不绝的香火。

位于梅江下游的松口镇，是历史上整个梅州地区客家人出海的核心内河枢纽。贯穿梅州境内的梅江与韩江，并由此通往潮汕沿海港口，为客家人出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水路条件，作为曾位列广东内河第二大港的松

【作者简介】李小华，任职于华南理工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媒介社会学、区域文化、国际传播。

马静忆，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文化、国际传播。

基金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东南亚客家影像文献的族群意识书写与中华文化认同研究”（21BMZ021）阶段性成果。

口港，正是这一水运网络的关键节点，其地理位置优越，向西可连接五华、兴宁、梅县，向北则通达赣州、汀州等地。^[3] 来自水打伯公等上游码头的船只多在此进行驳运，客家移民于此换乘较大船只，经汕头转道出海。这条水路不仅是客家人走向海外的重要通道，也是一条承载物资往来、商贸活动的繁忙动脉。

码头同样承载着人员运输的功能。许多客家人从这些码头乘船前往松口港，继而换乘前往汕头的船只，最后从汕头海港乘坐木船、舢板、帆船等交通工具，一路颠簸，在南洋各地上岸定居、谋生。^[4] 仅民国时期，松口镇就有关帝码头、火船码头、天后宫码头等26座码头，支撑大规模移民和物资的流动，其中火船码头是梅江水运经韩江出海的最大码头；南洋侨汇与侨资的注入，进一步强化松口码头的独特地位，使其从客家移民东南亚的交通节点转为区域性金融与信息的枢纽。^[5] 松口的繁华程度甚至超越了梅州州城，以至于有“自古松口不认州”的说法流传。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此设立“中国（梅州）移民纪念广场”，印证了其移民集散中心的历史地位。

以梅江水系为主的航道并非客家人前往汕头的唯一通道，汀江—韩江线路同样承担着输送客家人移民的重要功能。汀江被誉为“客家母亲河”，干流全长322千米，其航运在客家人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自南宋末年“潮盐入汀”起，汀江航运正式开通，虽沿途多急流险滩，但历经八九百年的持续治理，已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其典型运输线路为：自汀州码头起航，经上杭、永定峰市抵达广东大埔三河坝，在此汇入韩江主干道，继而经潮州、汕头出海，最终依托海上丝绸之路通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6] 位于此线路上的大埔县茶阳镇，则是其中一个重要枢纽。《大埔蓝氏族谱》记载，“三十年来埔人之冒险进

取，奔走于新加坡、槟榔屿、吉隆坡及安南、暹罗等处……莫不有茶阳之民族焉。”^[7] 茶阳作为大埔人前往东南亚的重要内河起点，其地位由此得以体现。这座位于汀江下游的重要码头，同时也吸引了来自福建永定等汀江中上游地区的客家人。他们汇聚于此，乘船顺流而下至汕头出海。永定地处闽西南山区，与粤东北的茶阳山水相连、地域相接。在缺乏现代交通工具的年代，翻越群山、徒步至茶阳这般可通航的水运节点，成为这些客家人远赴海外旅程的必经之路。



图1 1920年前后梅江上的帆船航行

内河码头与往来船只，共同串联起客家人前往海外的路线。直至20世纪中叶，客家地区的内河航运依然活跃。据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巴色会传教士影像档案显示，1911至1925年间，梅江上仍有帆船航行，而1937至1948年期间，还可看到客家船夫以竹竿撑驾人力小船往返于梅县与汕头之间。由此可以合理推断，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移民高峰期，梅江上的主要航运方式应与



图2 1940年前后梅县至汕头航线的客家人力小船

此类同。早年的客家移民，正是搭乘类似的人力小船或帆船，自原乡启程，抵达松口或茶阳等码头，继而沿韩江下行至汕头，然后换乘远洋船舶，借助季风航向东南亚各国。

对闽西客家人而言，厦门是通往海外的主要出海口。自厦门出发的航线，在东南亚逐渐形成了以马尼拉和新加坡为核心的海外网络，并进一步向婆罗洲、马来半岛等地延伸，持续为当地殖民经济输送劳动力。^[8] 经此路线出洋的闽西客家人，同样难以摆脱殖民苦力贸易的剥削。码头周边用以管控契约华工的“猪仔馆”，往往戒备森严，窗户狭小，内部环境污秽不堪。由此可见，客家人选择下南洋的出海港口和码头，既受原乡地理区位的制约，也与殖民口岸的分布密切相关。这些原本作为出海谋生的码头，演变为殖民暴力实施的场所。在此背景下，客家人向东南亚迁徙的开拓历程，实质上已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浪潮中。

二、家书和侨批编织跨域社会网络

侨批是一种“银信合一”的特殊载体，既是汇款凭证，也是家书，在19世纪中叶盛行并由水客和批信局递送。^[9] 侨批不仅是海外客家人为原乡亲人提供经济援助的重要途径，也是维系他们与原乡情感联系的纽带。水客与侨批局的组织与运作，成为连接客家原乡与南洋的通道；侨批中的书信，记录了移民者的行程经历和情感体验；信封上的邮戳、批号等标记，串起一幅连接海外与故乡的“隐性”迁徙路线图，勾勒出近代客家移民南下东南亚的历史图景。

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中期，侨批网络开始萌芽并逐渐形成，水客是批信局出现之前侨批网络的主要经营形式。^[10] 水客利用自身往返南洋和原乡之便，为侨胞捎带银信，一般按汇款金额抽取10%的手续费作为酬劳。^[11] 华侨通过水客或相识归侨寄送汇款，由于彼此相知相熟，水客对送批的地址了若指掌，

批信上无需写明地址也可准确送达。如现存记载最早的侨批，于1858年由吧城（今雅加达）寄往客家聚居地梅州松口，批封上没有写明地址，是典型的水客运送侨批。^[12] 至十九世纪中期，水客业务越来越多，但这种依托传统人际信用关系的递送方式也存在风险。近代邮局、批信局产生后，仍有许多人委托水客带批。为加强管理，官方机构开始签发有水客姓名、籍贯、照片及签发机构信息的水客证，作为合法身份的凭证。

水客在侨批的流转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跨国移民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3] 根据英属马来亚政府1914年的统计数据，约80%的华人移民是通过亲友引带而非契约劳工方式抵达。^[14] 客家人前往马来亚的主要方式亦如此。至1940年，梅县丙村从事水客职业的仍有50多人，70%的丙村马来亚华侨都是由水客或亲人带出去的。^[15] 这些职业水客活跃于南洋与客家侨乡之间，为华侨和乡民提供服务。

水客的引导可帮助新客避开旅途中的潜在风险，顺利抵达目的地。因水客熟悉路线且值得托付，他们的服务范围也从引导新客延伸至带送家眷。许多华侨因工作繁忙或身处偏远地区无法返回家乡完婚，或者希望妻子儿女前往南洋团聚，也会委托水客带送家人。水客本身就是华侨、海外华人移民，因而也是客家人移民东南亚的“活地图”。除了带路，部分水客还会协助新移民的就业和安置。如水客为移民垫付旅费，并将移民引荐至雇主处，雇主向水客支付酬金，移民则通过务工清偿付款。

随着华侨人数增多和侨汇量增加，零散的水客逐渐组建成专业化的批信局，如水客郭有品创办的“天一”侨批局。^[16] 批信局是19世纪中期出现的商业公司，专门从事向海外输送劳动力、在侨民网络中运送货物、处理私人商业信函，以及向中国移民提供汇款和其他银行服务。批信局不仅完善了侨批

的收揽、寄递网络，还通过组织化的运作，进一步促进了客家亲友移民。它们建立起稳定的行馆网络，为客家新移民提供落脚点，并协助安排工作，使移民链条得以持续运转。据《大埔县志》记载，民国时期大埔县登记发证的侨批局有12家，这些机构与各地商号形成紧密合作，蕉岭县在新中国成立前曾有10家商号代理汇业务，部分还兼营钱庄；^[17]共同建立了一个横跨金融、通信和移民服务的综合性机构。



图3 从马来西亚檳城寄往广东梅县的侨批

侨批中的文字，承载了客家移民的乡愁和应对出洋南下途中挑战的生存智慧。移民常于信中描述南下路线、汇报生活状况、问候家族亲人。图3为一马来西亚檳城寄往广东梅县的侨批，从中也可看出这一通过书信维系情感、提供帮助的传统。虽未标注具体年份，但根据经由“鲨鱼涌”中转这一线索，推测该侨批应寄于20世纪40年代，其批封上注明“内兼外银4元”经“鲨鱼口（鲨鱼

涌）”至“梅县”，表明客家移民在动荡时局中仍竭力寄款回乡、维系家人生存的努力。侨批不仅是南洋与原乡物资的传递通道，也是客家移民维系情感联络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

早年，客籍华侨在异国他乡谋生条件极为艰苦，但始终任劳任怨、克勤克俭，将辛苦积攒的血汗钱托寄回乡，用以赡养父母、抚育妻儿。侨汇因而成为许多客家家庭重要的经济来源和情感纽带。抗日战争时期，尽管战火阻隔，侨批仍艰难辗转于南洋和故土之间。比如，上图这封来自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侨批，信封左上角可见“Bondowoso”字样，邮票上印有“NED. INDIE”，表明其寄出地为爪哇岛的文多禾梭，信封右侧盖有“DOOR CENSUR GEOPEND”（意为“经审查开启”）的审查章，显示出战时邮件受到严密监管的痕迹；而“香港”“鲨鱼涌”“梅县”等邮戳信息，则勾勒出这封侨批几经辗转的递送路线。图5信封同样可见“香港”“鲨鱼涌”“大埔县”等字样，其与外文邮戳相互印证，共同记录了一条战时秘密邮路的具体流转路径。^[18]这些侨批实物，成为南洋客侨心系原乡的珍贵物质遗存。对南洋客侨而言，侨批能否安全寄达，关系到家乡亲人的生存温饱；而对梅县、大埔县等地的收批人来说，每一封侨批都是烽火中家人平安的凭证，承载着血浓于水的牵挂和希望。



图4 抗战时期经鲨鱼涌中转的侨批封：印尼寄梅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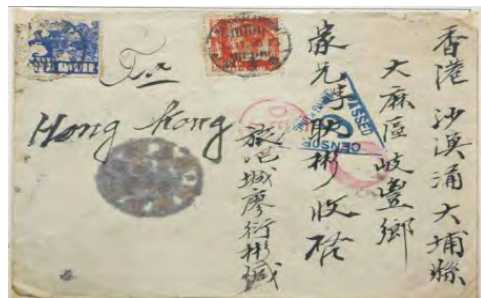


图5 抗战时期经鲨鱼涌中转的侨批封：印尼寄大埔

三、纪实影像和口述历史记录个体生命体验

自19世纪20年代始，东南亚殖民者为满足经济开发需要，建立一套以诱骗和拐贩为主要手段的契约华工制度，大量客籍华工卷入其中。虽然殖民政府的档案对华工数量和管理有所记录，却将这种带有奴役和剥削性质的制度，粉饰为华工“自愿出洋”的个人选择。而口述史料可以追溯这些历史事件，让那些不掌握话语权的人们也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同时可以弥补传统档案资料因一些因素造成的片面、缺失和信息过滤。

20世纪60年代，由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室和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千余名东南亚归侨进行口述史采访，记录整理成《猪仔华工访问录》，成为后世批驳一些殖民叙事的珍贵文献和有力证据；这些接受采访的客籍归侨，多数有被贩卖至印尼日里种植园和邦加锡矿充当契约华工的亲身经历。^[19] 那些被卖往国外的客籍华工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壮年贫苦农民。因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导致了农民的普遍贫困；闽粤客家人之所以下南洋，主要缘于经济的压迫……原乡的艰难生活，加之南洋的招引，一推一拉，便造成了一股移民潮。^[20]

到了异国他乡，这些华工同样只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口述史料中记录的个人经历，真实地还原了他们当年离乡背井的情景。比如，广东惠州上埔乡一村民因家乡“地少，当长工一年的工钱也只有十块银元”，在“猪仔头”宣称“到南洋能够发财”的诱惑下，于1910年卖身至日里烟草种植园；陆丰县东海一村民因“家里很穷，父母早已双亡”，兄弟数人“经常挨饿”，在一位“老番客”的招工诱导下，也踏上了前往日里的路途；陆丰县望寮村一村民则因“还不了债”而被迫离家，与同乡结伴步行

至汕头，卖身得40银元后前往日里。^[21] 这些口述史料不仅揭示了客籍华工被迫离乡的直接动因，也再现了他们高度相似的启程经历：多数人在“猪仔头”的诱骗下，从家乡辗转至汕头等出洋港口，卖身换取微薄银钱，再登上远洋轮船，最终被运往殖民者控制的南洋种植园。

纪实影像为此亦提供了生动的印证。在一段发布于YouTube的口述影像中，一位马来西亚沙捞越新尧湾的陆丰籍第五代客家人谈到，由于新尧湾的河流与沙捞越河相连，从下游运来的货物需在此换乘小船，方能继续驶往河道较浅的上游；因此，早期迁居至此的客家人多以经商为业，而非充当劳工。据他讲述，受1857年华工起义遭镇压的事件影响，早期移民多数遭屠杀或流散各地，其祖先应属第二代移民；通过当地庙宇中一块光绪十二年（1886年）所立的牌匾可以推测，至迟在1886年，客家人已在新尧湾定居并从事商业活动。另一部专题片《客家人有名堂》马来西亚篇也展现了相似的情景。片中介绍，第二批抵达的客家移民敏锐地捕捉到马六甲码头船运繁忙所带来的商机，他们在马六甲河沿岸开设打铁铺和洗衣店，通过为往来船只提供修补服务，为船员和旅客浆洗衣物，逐渐在当地扎根谋生。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片拍摄时，马六甲古城区内仍有客家后代在经营这些从先辈手中传承下来的店铺。

但无论是自由移民还是契约华工，早期客家人抵达南洋后的第一道关卡，往往是带有殖民筛选性质的检疫站。口述历史纪录片《下南洋》第三集通过亲历者的讲述，再现了包括客家人在内的早期中国移民在新加坡圣约翰岛接受检疫的场景。该检疫站于1874年11月启用，当时便接收了从暴发霍乱的“SS Milton号”船只下来的上千名中国乘客。^[22] 然而，这座号称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关检疫站，检疫程序并非出于人道主义的医疗

保护，而是作为殖民入境管制的一环：通过者获准居留，被拒者则面临遣返甚至死亡的厄运。正如纪录片中广东三水籍新加坡华人所回忆：“要消毒，要验痘……刀来割我们的肉。在那里的十天，我们走来走去没事可做。”众多前往英属马来亚的华侨华人，都曾在此经历严酷的筛选。实际上，在该制度实施初期，就有不少人批评圣约翰岛的检疫程序过于严苛且流于形式。^[23]然而正如专题片《客家人有名堂》所呈现的，直到20世纪中叶，这种严苛的检疫程序依然存在；如1947年，时年十三岁的客家人宋群礼随母亲前往马来西亚投奔父亲，仍需先抵达新加坡，在接受硫磺水洗澡、打疫苗等检疫措施，并获得殖民政府颁发的登陆证后，才能换乘一艘仅能容纳二十多人的小船，继续前往最终目的地。这段经历，成为包括客家人在内的东南亚移民集体记忆中有关“人祸”的深刻烙印。



图6 圣约翰岛等待接受检疫的人群

对早期搭乘帆船或蒸汽轮船南渡的客家移民而言，航程中除了承受殖民制度下的“人祸”，还须面对风暴肆虐等自然威胁。离乡与失散，成为客家南洋移民又一道深刻的印记。纪录片《丝路南洋》第二集透过移民后代的追忆，再现了祖辈为求生计远赴南洋的艰辛历程。如据193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吴德芳回忆，其父母因在梅县农村无法维持温饱，只得离乡南渡，“如果在家乡有温饱的话，谁也不会离开”，他们仅带一身衣

物，从汕头乘船历经七天七夜的风浪抵达马来西亚，“很有可能船在大海上就沉了”；另一位祖籍梅县畲江的第三代客家移民李金龙则回忆，其祖母曾带着年少的父亲赴马来西亚，投奔早年被“卖猪仔”至南洋的祖父，但在途中与亲人失散。专题片《客家足迹》第九十六集则围绕“有海洋的地方就有客家人”这句俗语，在早期客家人登陆泰国合艾市的海岸旁，采访了合艾市开埠者之一、蕉岭籍客家人徐锦荣的侄女徐玛丽。她转述了先辈的迁徙经历：客家人从广东出发后，主要经由两条路线抵达合艾，一条途经印尼、马来西亚，另一条则途经越南；但无论选择哪条路线，他们所乘坐的登陆船只都十分破烂，“船上很挤，不小心困了睡着了，就会掉进海里”。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代际口述，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局限，反映了客家人当年离乡背井的波折与其所承载的沉重代价和风险。

口述历史的档案资料和纪录片影像，丰富了客家人移民东南亚的历史图景。尽管个体叙述“充满了主观性、不确定性和变动性”，但当个体置身于命运共同体中，其记忆便会经由“共同的社会经历和由此结成的密切关系、集体的解释框架，以及由思想、语汇、修辞乃至各类仪式组成的表意系统”等突生机制，最终转化为集体记忆。^[24]对移民东南亚的客家群体而言，他们共同面对的原乡生存压力和跨海经历，成为这一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底。关于被诱拐的个体叙述，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记忆，而是融入客家族群迁徙东南亚历史的集体记忆，并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早期东南亚客家移民的历史，是一条贯穿物质流动、制度建构与记忆传承的复合轨迹。从码头、航船所构建的物理通道，到侨批、水客所维系的社会网络，再到口述影像所承载的情感叙事，客家移民在殖民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夹缝中，展现了超

常的适应性与文化韧性。他们不仅塑造了东南亚的经济图景，也构建了一个跨越海洋的“想象共同体”。

注释：

1. 图1、图2源自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巴色会传教士档案。
2. 图4、图5源自广东梅州市侨批档案馆。
3. 图3源自汕头大学图书馆。
4. 图6源自英国国家档案馆。

参考文献：

- [1]陈春声：《论1640—1940年韩江流域民众“客家观念”的演变》，《客家研究辑刊》，2006年第2期，第1-14页。
- [2]梅州日报：《老梅城的码头》，2025年9月13日，https://mzrb.meizhou.cn/html/2024-08/01/content_362242.htm。
- [3]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梅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12、453页。
- [4]邓锐：《梅州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第38-39页。
- [5]松口镇志编纂办公室：《梅县松口镇志》，松口镇志编纂办公室，1990年，第7、35、44、56页。
- [6]贵州政协报：《南宋至民国时期汀江的商业航运（上）》，2025年9月16日。https://www.gzsxx.gov.cn/gzxxb/web/doc/detail/d_1336502992764960。
- [7]蓝海文：《大埔蓝氏族谱·卷七》，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第632页。
- [8]丘进、张禹东、骆克任、李明欢：《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32-133页。
- [9]焦建华：《试析近代侨批跨国网络的历史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87-95页。
- [10]同[9]。
- [11]黄清海：《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页。
- [12]黄清海：《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7页。
- [13]郑一省：《水客与近代中国侨乡的金融网络及移民网络——以闽粤侨乡为例》，《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第78-82页。
- [14]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114页。
- [15]梅县丙村镇志编辑部：《梅县丙村镇志》，梅县丙村镇志编辑部，1993年，第193页。
- [16]同[9]。
- [17]李小燕：《梅州地区客家侨批业初探》，《汕头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82-86、89页。

[18]人民日报海外版：《侨批见证抗战时期家国联络“生命线”》，2025年9月24日，https://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5-06/24/content_1580145.htm。

[19]刘玉遵、黄重言、桂光华、吴凤斌：《猪仔华工访问录》，广州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1979年。

[20]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48页。

[21]同[19]，第72-74、98、119页。

[22]LEE Y K. Quarantine in early Singapore(1819-1874):Part II[M].Singapore:Stamford College Press (Pte) Ltd,1978:86.

[23]同[22]，第82-83页。

[24]周晓虹：《口述历史与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第137-146页。